

「記憶轉向」和史學觀念的變革

王晴佳^{*}



王晴佳 教授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全球範圍的歷史研究開始產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其影響到了今天，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顯著。這些變化，不但影響了人們對「歷史」的態度，同時也影響了研究歷史的方式。如果要將兩者稍微加以區分，前者是有關歷史進程、走向和趨勢的看法，而後者指的是「史學」，亦即人們如何回憶過去並對這一回憶加以記述、分析和解釋的工作。回顧過去，也就是歷史記憶。這是歷史研究、也即史學的起點。因此，「記憶」（memory）與「史學」（history 或 historiography）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史學界所產生的變化之一，就表現為人們對「記憶」與「史學」，逐漸產生出了一種新的認識。這一新的認識，在當今的歷史研究中，反映十分明顯。因此有

人指出，二戰以後史學的發展，不但有所謂「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也有一個「記憶的轉向」（memory turn）。前者產生於一九七〇年代，而後者則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成為熱點。¹

要解釋和界定這一「記憶的轉折」，我們似乎有必要回顧一下記憶與史學之間的傳統關係。我們說記憶是史學的起點，指的是史學研究的開端，常常起源於一種保存記憶的願望，中外皆同。中國有「結繩記事」這樣的古話來形容史學的誕生。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中開章明義地指出，他之所以寫作該書，是因為他希望保存人們對希波戰爭的記憶。用他的原話來說，就是希望「人類的豐功偉業，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被遺

^{*} 美國羅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長江講座教授。

¹ Geoffrey Cubitt, *History and Mem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忘」。由此看來，記憶與歷史之間，既有一種相互依存，又有一種相對緊張的關係。具體而言，記憶——也即有關過去的回憶——對於人類社會的延續以及個人的生存，至關重要。中國有「鑒往知來」的古訓，而西方的哲人對於記憶之於人類的重要，也有許多警語。如培根（Francis Bacon）說過「歷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an wise），而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更強調：「不能記住歷史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可是，雖然史學最初是幫助人們記憶的工具，但一旦史學成為一門學問以後，它又企求建立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就不滿足於與記憶相等同。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近代史學的誕生的一個前提，就是將史學與記憶之間做了明確的劃分。易言之，我們要瞭解當代史學的「記憶的轉向」，或許我們首先應該知道為什麼史學與記憶曾一度分道揚鑣的經過和原因。

史學與記憶在近代的劃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史學雖然在廣義上而言，也是一種記憶的表述或再現（representation of memory）。但史家寫作歷史，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希望通過回顧過去，以便更好地瞭解現在和展望未來。上面引述的一些古訓和哲言，都是極好的例子，無需詳述。而到了近代，史家研究歷史，則還有一個宏偉的目標，那就是分析、解釋並預測人類歷史的整體走向。為了這個目的，因此就有不少人開始探尋歷史的規律，希圖由此勾勒古往今來的歷史演變進程。這一努力，不但見之於黑格爾、馬克思、孔德等哲學家的著作，而且也激勵了不少

史家。如英國史家阿克頓（Lord Acton）在主編《劍橋近代史》的時候，就提出該書的目的，就是要為寫作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做鋪墊。換言之，阿克頓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種普世的記憶，為所有的人所接受，雖然他承認，這樣的普世史，在他那個年代還無法完成。² 德國史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也認為人類歷史有其內在的「一致性」（coherence），因此他在晚年，就投身於寫作一部世界史，亦即普世史。這些近代史家都相信歷史的演進過程背後，存在著一種內在的規律性和一致性，而史家的任務就是要發現一種「宏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然後將之適當地、科學地展現、表述出來。由此，史學與記憶之間，就產生了一種鴻溝，因為記憶雖然可以分享，但主要是個人的、主觀的。它可以被分享，但這一分享也受時空的限制，常常是屬於一個時代的和一個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共同體的。甚至，性別的區分，也造成了記憶的不同。因此，就記憶的特徵而言，可以說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超越時空、文化、地域、語言的共同記憶。

史學與記憶在近代的另一個區分，表現在方法的層面。或許我們這裏可以借助史學思想家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表述來加以形容。柯林伍德說，如果某人說「我上周寫信給某某」，這只是一個記憶的表述，而不是歷史的表述。但如果這個人又說「我沒有記錯，因為這裏有對方的回信」的話，那就變成了一個歷史的表述了。³ 顯然，對於柯林伍德來說，記憶與史學的區別，在於後者必須要有證據。的確，史學在近代的根本變化，在於史家研究方法的改進。蘭克之所以被譽為「近代

2 Lord Acton, *Longitude 30 West: A Confidential Report to 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另見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62), p. 3。

3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p. 252-253.

科學史學之父」，就是因為他強調歷史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確鑿的、經過核實的一手材料之上。而且，到了蘭克的年代，史家已經掌握了一系列檢驗史料真偽的手段，因此他們就更想將史學與記憶加以區分了。

那麼，為什麼自上世紀末至今天，記憶開始又與史學聯手了呢？抑或更準確地說，為什麼史家願意降低身段，開始研究記憶了呢？毋庸贅言，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解答。第一，有關記憶的研究，是戰後發展起來的一個顯學。相對其他學科，史家開始研究記憶，相對較晚。第二，記憶研究之所以會引起史家的重視，又與史學本身在戰後的諸種變化，切切相關。這些變化，主要指的是史家對史學研究態度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之所以產生，又與戰後世界文化氛圍的轉變，有著密切的聯繫。

記憶研究在戰後的興盛，當然與二次大戰的爆發及其特點有關。一般而言，戰爭的爆發會讓人記憶深刻。希波戰爭會促使希羅多德寫作《歷史》，便是一個顯例。而二次大戰中又有一個相對特殊的現象，那就是希特勒德國的種族滅絕政策，亦即屠猶（Holocaust）。這一屠猶的實施，其規模史無前例，不但讓受害者或倖存者不堪回首，也讓其他人為之唏噓感歎。不過雖然不堪回首，但在戰後，猶太的倖存者及各種猶太人的團體使用了各種力量，推動有關這一事件的研究。就史學界而言，目前發行的《史學與記憶》（*History and Memory*）的這本專業雜誌，就是由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編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發行的。屠猶當然只是在二戰期間所發生的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除此之外，歷史上還有不少相似的暴行。⁴ 近年南京大屠殺也

成為記憶研究的一個熱點。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書，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以後引起了許多反響。張在書中直截了當地指出，南京大屠殺是一個讓人遺忘了的種族大屠殺（the forgotten holocaust），並將這句話列為書的副題。這個例子也表明，記憶研究並不是史家的專利。相反，有學者指出，記憶研究（memory study）雖然以跨學科為特徵，但其主要的研究者來自文學、電影和文化研究等注重「再現」（representation）的領域。⁵ 記憶研究的材料，也往往超越了文獻資料，而特別注意實物（博物館、紀念碑、陵園等）和口述回憶（採訪錄、回憶錄等）。

換言之，如果史學觀念本身沒有發生變化，史家仍然專注政府的檔案為其基本史料，那麼記憶研究在史學界也無法開展。饒有趣味的是，戰後史學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已經為史家轉向記憶研究，提供了條件和準備。這裏要強調的是，當今史家從事記憶研究，並不主要是為了追隨大流，而是與學科發展的「內在理路」有不少關係。舉例來說，如果說記憶研究的一個方法就是進行採訪，搜集口述材料，那麼史家在這方面，既有傳統，又有創新。古代史家的寫作，基本上都取自口述的史料。而在二戰以後，口述史的興起，更早於記憶研究的興盛。口述史的興起，得益於兩個方面。一是戰後西方殖民主義的終結，不少西方的殖民地走向獨立。這些國家原來沒有歷史記載的傳統，因此文獻史料缺乏。但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歷史著述又是重要的一環。因此史家便從事口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為寫作民族史發掘、掌握和提供素材。而在發達國家，一九六〇年代蓬勃開

4 《史學與記憶》的雜誌還請印第安那大學的中國史教授司徒琳（Lynn Struve）編過一個專輯，探討中國歷史上的戰爭暴行以及所帶來的「創傷記憶」（traumatic memory），16, 2 (Fall/Winter, 2004)。

5 Katharine Hodgkin & Susannah Radstone (eds.), *Contested Past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3.

展的學生運動、人權運動，又促使了史學研究的平民化（democratization），一些原來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和事件，也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口述史料的整理和運用以及在此基礎上寫作口述史，也慢慢形成風氣，並進而成為現代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由此看來，口述史的研究，為史家從事記憶研究，提供了前提。當然，兩者之間又有許多不同，特別在研究對象和方法等方面，此處無法詳述。⁶ 我們更為關心的是口述史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興起的背景及其反映的歷史意識的變化。應該說，口述史的興起與社會史、公共史（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的興盛，殊途同歸，有著內在的聯繫。簡單而言，如果史家仍然像十九世紀的蘭克那樣，堅持認為史學研究必須基於「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的檔案），那麼口述史就無從興起，當今的記憶研究也無法進入史學的殿堂。因此史學觀念的變化，是記憶研究與歷史研究，特別是口述史研究聯手的主因。而史學觀念的變化，又是思想文化變動的產物。

首先，二戰的爆發和戰後世界秩序的變動，使得人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有了新的感受。原來認為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能引領世界歷史的演進。但殘酷的現實卻是，這一競爭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大量的傷亡，也導致了世界秩序的變化——表現為英法等國的衰降、美國的興起及美蘇之間的爭霸等。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的衰落，又導致了後殖民時代的來臨，孕育了第三世界的崛起。這一崛起，到了今天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勢不可擋——其主要表現為民族獨立運動的開展、亞洲四小龍的發達和當今中國大陸和印度

的經濟騰飛。原來西方政治家縱橫捭闔，主宰世界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既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等精英人物無法像以前那樣影響歷史的進程，那麼史家的眼光也漸漸從他們身上轉移開了。

其次，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的人權運動、反戰運動的開展，展現了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以及社會的結構性變遷。社會史的興起，抑或歷史研究在戰後的社會科學化，正反映了這一趨勢。史家把眼光從精英人物身上轉到了社會大眾，並相信社會大眾才是歷史運動的動因。而為了研究社會史和公共史，就必須突破原來有關史料的觀念，嘗試運用新的、政府檔案以外的史料。於是口述史料就開始為人所重視，由此而推動了口述史、公共史的研究和當今的記憶研究之間的密切互動。⁷ 當然，史學界開展記憶研究，並不局限在口述史和公共史等領域。

第三，史家能接受和運用口述史料，其實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上所述，口述史研究與記憶研究之間，起初存在一種複雜的關係，既相互支持，又相互抵觸。這是因為史家整理口述史料，往往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規範，以求做到整理者（採訪者）在整理的過程中，不把自己的觀點和態度強加在被採訪者的身上。這種作法，顯然還是反映了近代史學的傳統——史家希望其歷史著作能讓歷史說話，儘量不帶作者主觀的意見。近代史家蘭克，被人尊崇為「客觀史家」，就是因為他曾主張「如實直書」。但記憶的研究，主觀性和現實性很強。就史料而言，往往是受害者的回憶，可以讓人聲淚俱下。即使研究一些如紀念碑、紀念館等建築物，其中的設計也明顯反映了建造師或者營造者的主觀意念。如果史家對史料的態度一

6 有關口述史與記憶研究的關係，參見 Paula Hamilton & Linda Shopes (eds.),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Memor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有關口述史與記憶研究之間的聯繫，見上引 Hamilton & Shopes,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Memories*。有關公共史與記憶研究，見 David Glassberg, "Public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Memory," *The Public Historian*, 18, 2 (Spring, 1996), pp. 7-23。

仍其舊，那麼記憶研究也就無法在史學界登堂入室。有趣的是，隨著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衝擊，蘭克等人所標榜的「客觀史學」，已經成了明日黃花，不再為人所信奉。記憶的個人性（individuality）、時間性（temporality）和主觀性，都已經不再成為問題。相反，有學者認為，當代史家之所以研究記憶，抑或史學界「記憶的轉向」的出現，正是因為記憶不像歷史事實那樣「客觀」和「硬邦邦」。相反，史學界「記憶的轉向」所突出的，正好是史料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和史家如何從現在出發再現歷史。⁸ 上述特徵，都反映了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研究和著述的影響。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出發，有人已經提出「記憶」應該取代原來的「傳統」（tradition）、「民俗」（folklore）和「神話」（myth）等觀念，因為後者其實都並不客觀存在，只是依靠記憶或通過記憶打造出來的。⁹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話來總結史學界的「記憶的轉向」所揭櫫的史學觀念變化，那就是近代史學的前提，是要把過去與現在隔離開來。史家雖然在現在回顧、研究過去，但其目的是讓讀者通過閱讀其作品，重新回到過去。這一態度無法容忍「現在主義」（presentism）的治史態度。而當今史學的記憶研究，則不但容忍過去與現在的交融，而且還把這種交融和互動，亦視為歷史現實的一部分。用 James E. Young 的話來解釋，就是「一旦我們把目擊者的回憶、他們回憶中的確實或不確實的部分以及他們回憶中的解釋的成分一併加以考慮的話，我們會對受害者的遭遇，有一種更深入

瞭解。這些對於過去的敘述已經成了他們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如何敘述他們的遭遇，也就成了歷史現實的一個部分了」。¹⁰ 換言之，剔除口述史料中的主觀成分，已經不再是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了。

最後，當今史學界的「記憶轉向」，也得益於記憶研究在其他學科的發展。特別要指出的是社會學家 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在上世紀初提出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個概念以及在此以後其他人對之不斷提出的商榷和修正。有人主張用「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來取代「集體記憶」，還有人主張去掉「集體」或「公共」這些形容詞，因為記憶雖然看起來是個人的，但其實都是在特定的集體、文化等場域形成的。¹¹ 但無論如何，這些修正的工作，都有助於推動人們對記憶的瞭解和認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集體記憶」這個概念提出以後，人們開始注意到記憶形成的各個層面以及記憶形成這一過程在民族建構、族群構成和文化變遷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記憶研究在這些層面所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也吸引了史學家，因為這些問題，一直是近代以來史學研究的核心課題。史學與記憶的再度聯手，於是也成了勢所必然。

8 Patrick H. Hutton, *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Hanover, V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另可參見 Robert Perks & Alistair Thomson (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6)，特別是第三部分的有關論文，頁 211-332。

9 Gil Eyal, "Identity and Trauma: Two Forms of the Will to Memory," *History and Memory*, 16, 1 (Spring/Summer, 2004), p. 8. 又可參見上引 Hutton, *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

10 James E. Young,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The Uncanny Voices of Historian and Survivor," *History and Memory*, 9, 1 (Spring/Summer, 1997), p. 55.

11 參見 Cubitt, *History and Memory*。此書對於記憶與史學關係的探討，十分周全。

